

一年仅有十几场演出,全部是义演;尝试商演,定价 100 元的门票,只卖出去 6 张,为了不致冷场,2 万张票改卖为送,一场晚会,70 万元的巨大包袱兜头而下……

“农民工艺艺术团”的悲情坚守

本报记者 马学礼

天空阴沉沉的,清冷的风中,杨兵团迎候在门口。消瘦的身形上,一件灰色 T 恤松松垮垮,黝黑的面庞上,不见丝毫笑容。“就剩下他们几个留守,其他人都放假回家了”,简陋的排练大厅里,杨兵团指了指四个练习舞狮的小伙子。

“想不到会是今天这个局面”,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作为“宁夏大舞台农民工艺艺术团”的创始人,不到两年的“从艺”之路,用他的话说几乎是“滚着过来的”。辛苦付出过后,杨兵团发现,目标依然遥不可及。

“我想改变别人怪怪的眼光”

杨兵团的故乡在宁夏西吉县农村,贫困的物质条件不能阻碍村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在当地,北方风格的舞狮长盛不衰,每至重大节日,都会举行盛大的舞狮表演,很小的时候,杨兵团就迷上了这个行当。穿戴好行头,在舞台上跳跃、翻滚,万众瞩目中,杨兵团常常体会到明星般的感觉。“贪玩”的他渐渐为此付出代价,14 岁那年,读三年级的他实在读不下去了,辍学回了家。

出去闯闯吧!怀揣父亲给的 30 元钱,杨兵团跟着同村人外出打工。外面世界的美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看着不少人用打工挣的钱盖起了新房,杨兵团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像出了笼子的鸟”,杨兵团这样形容当时的兴奋。

现实还是给他上了一课。在新疆星星峡修公路,繁重的体力劳动让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开始体验生活的艰辛。与腰酸背痛相比,一直不能被他接受的,是老板经常无端地责骂。“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人呢?”“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同伴

的提醒反倒更让他迷惘——我就是干活挣钱,没别的,出了错该怎么罚就罚,我认了,为什么要这样。

三个月后,只挣了一点钱的他,心有不甘地与人结伴去陕西打工,干了一年准备结账回家,老板却消失了。

“那是我们的血汗钱啊!”杨兵团愤怒却不知所措。那段时间,杨兵团常常做梦,梦中不见老板,不见随着老板消失的工资,只有舞台上自己矫健的身影和台下众人赞许的目光。

这样的经历在他此后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多次重演。在辗转各地打工的磨砺中,杨兵团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了颇有积蓄的小包工头。在故乡人眼里,他俨然一位“成功人士”,可内心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城市里处处可以看到别人怪怪的眼光”。尽管工友中许多人很有才艺,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可是干完活去小饭馆吃饭时,邻桌的客人常会在鼻子前挥挥手,有的干脆移桌另坐。偶尔去买东西,也会遭遇“价格歧视”。

摸摸腰包,杨兵团自信有足够的实力把自己“包装”成“受人尊敬的人”——在银川买房、买车,再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接来同住,彻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可回头看看跟着自己打工多年的几十个兄弟,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要想不被歧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形象”,杨兵团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可怎样改变呢?

2012 年 5 月,打工十多年的杨兵团在银川注册成立了“宁夏大舞台农民工艺艺术团”,从农民工中招募了 40 多名演员,花钱配置了演出音响设备,服装和车辆,租下了 200 多平方米的排练大厅。演员集中住宿,统一管理,

每人每月领取 3000 元工资。

想像一下农民工演员们舞台上光鲜靓丽的形象,杨兵团激情满怀。“别人再也不会用怪怪的眼光看我们了吧?”杨兵团这样想。

“为什么这么难”

尽管自信是个吃过苦、关键时刻扛得住的人,可事情的发展还是令杨兵团吃不消。艺术团草创之初,花钱的地方特别多,一切尚未准备就绪,杨兵团多年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

有人提议,要他改变思路:演员平时各自打工,有演出任务再集中。杨兵团拒绝了别人的好意,“演员只有集中精力,才能搞出好节目来”。

为了站稳脚跟,杨兵团也尝试着承接一些庆典活动,“毕竟庆典活动跟艺术还沾点边,总比回到工地上继续干那些泥水活强吧。”杨兵团这么理解。可农民工艺艺术团的名称,又往往让对方觉着档次低,几乎没人愿意把活交给他们。

特别困难的时候,几个被他“从艺”初衷打动了的朋友解囊相助,帮他渡过了难关。但接下来的事,让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杨兵团切切实实地为难了。

艺术团排练的节目太单一,除了从家乡请来的舞狮节目,就剩下唱歌和舞蹈。有人替他出主意:高薪聘请专业创编人员和专业演员。杨兵团思索再三,觉得不妥,“那样还是农民工艺艺术团吗?”倔强的杨兵团根据自己和农民工的亲身经历自编、自导情景剧,内容大多是表现农民工的高贵品质与现实中的不公平待遇,演得比较顺手的团员说:“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准备“停当”的杨兵团,很快又陷入了

尴尬:没有人邀请艺术团演出,想着“主动送戏上门”,也大多无人理睬。成立的一年时间里仅有十来场演出,多数在银川周边的农村,而且全部是义演。杨兵团常常安慰自己:现在能获得掌声就够了,以后一步步会好起来的。

期待的转变没有出现,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2013 年 5 月 1 日,劳动者欢欣鼓舞的日子,杨兵团的心却冷到了冰点。

由于鲜有演出机会,有些演员不乐意了:“不能只拿钱不干活啊!”有人劝杨兵团在“五一”节这天搞一场大型商业演出,既能稳定军心,又能赚一些门票钱弥补一下亏损。确定时间、联系场馆,频繁出入文化、公安等部门去申报、登记,接受各类演出前的检查,并不熟悉商业演出流程的杨兵团几乎是摸着黑一步步走过来的。他邀请了从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中走出来的草根明星,利用各种形式去为晚会造势,盼望借助明星的号召力提升演出档次,赚得票房。舞台、灯光、音响他也坚持“要上档次”,算算账,起码需要好几十万元。有人不看好“钱景”,劝他取消演出,至多赔些违约金,杨兵团咬着牙摇了摇头。

“宁夏农民工艺艺术团庆五一文艺晚会”如期上演。精彩的演出,热烈的掌声难掩杨兵团内心的凄凉。他向所有演员隐瞒了实情:定价 100 元的门票,只卖出去 6 张,为了不致冷场,20000 张票改卖为送,“农民工艺艺术团”的称号还是遮掩了明星的光辉,大部分票被丢弃了。到场的 6000 名观众,几乎清一色是银川各工地的农民工。

锣鼓停歇,演出结束,演员们都默默地围在杨兵团身边。70 万元,一个巨大的包袱兜头而下。

“为什么这么难?”杨兵团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该怎么办”

杨兵团大病一场。大多数演员放了假,回家待命。出院后,杨兵团退掉了城里租住的房子,搬到了银川城北一家农场的破败院子里与留守的演员同住。面对冷冷清清的排练厅,他常常发呆,巨额的债务是几个朋友帮他垫付的,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压在他心头,沉重却无人能够分担。

为了争取演出机会,杨兵团“找过好多部门,但是脸色难看”。他坦言对“办成事情”几乎没什么指望,“人家能热情相待,耐心听我说完就让我很满足了。”他一直难以理解的是,银川及一些市县的各种演出繁多,为什么自己没有一点参与的机会。“或许给艺术团换个名字会好一些。”有人提醒他。几经掂量,杨兵团觉得那会背离建团的初衷,没有采纳。

守在电脑旁,杨兵团天天都上网寻找演出信息。累的时候,他就放一段“五一晚会”的录像回忆一下。“演出质量绝对没问题,关键还是有色眼镜的原因。”他一直这样认为。

在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凌乱地堆满了各种杂物。墙上显要的位置,挂着一面锦旗,那是一年多来仅有的荣耀。

演员们经常打来电话,有的询问何时集中,有的表示待命期间不再领取团里的工资。欠了过百万的债,也没有哪个朋友催着要,打来电话不是安慰他,就是主动提出给他再打些钱。

“他们都是好人,但我不能总这个样子下去啊!”丢几粒药进嘴里,他没有喝水就咽了下去,伸开双臂,各种各样的药盒被他拢在一起,“咔吧”作响。

“实在不行,就带着他们继续包工,还干那些泥水活吧!”他把药盒向前一推,眉头皱了皱说。

为省房租“蜗居”危楼



图①



图②

图①:11 月 21 日,浙江绍兴市东区东湖风景区内,大湖头村几间待拆的危房里,住着不少外地的农民工。为了节省生活开支,他们宁愿冒着危险住在房租低廉、被拆掉门窗和部分墙壁的危房里,这里每月的房租 300 多元,而市区其他民房的租金要贵得多。

图②:无独有偶,在绍兴市区东浦镇塘湾村一座房顶、阳台、墙壁门窗已被部分拆除的危楼中,几位来自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工也像往常一样生活着。这座危楼中共住了 5 户农民家属。

一位把新房安置在危楼中的安徽妈妈介绍,由于房租较贵,打工者收入微薄,无法承受,只能住在这座待拆迁的危楼中。虽然危楼破旧危险,但她的“新房”布置得还是很温馨,还把婚纱照挂在墙上。来自河南的农民工介绍,他们是专门从事拆迁工作的,由于当地房租贵,所以也只能借住在这里。

李瑞昌 摄/中新社

济南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启用

农民工15 类问题可“一站式”解决

本报讯 (记者丛民)11 月 20 日,济南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涉及农民利益相关的 15 类问题均可在该中心“一站式”得到解决。

新启用的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位于济南市兴济路上,该中心设置了综合服务大厅、职业介绍大厅、教育培训区和维权服务区四个区域。其中综合服务大厅设立教育指导、培训咨询、技能鉴定、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咨询、子女教育、住房保障、法律援助、劳动维权、卫生计生服务、志愿服务、统计服务、文化娱乐、党群管理和返乡交通服务等 15 个服务窗口和 1 条 12345 农民工服务专线窗口,可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生活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提供“一站式”服务。

据该中心负责人介绍,济南市目前有农民工 180 多万人。为了给农民工建立一个具有管理、服务、娱乐等功能的平台,济南市委、市政府决定,把市直机关党员培训中心承担的市直机关党员培训任务纳入市委党校,将腾出的机关党员培训中心改建为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

对外来务工人员有一颗关怀之心,不等同于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周遭的普通市民

“农民工尴尬让座”请别过分解读

韩韬超

据 11 月 21 日《太原晚报》报道,近日,在大原市 3 路公交车上,一位农民工给满头白发的老大娘让座,老大娘向小伙子表示谢意后并没有立即坐下,而是掏出纸巾把座位擦了好几遍才落座,小伙子则低头看了看自己脏兮兮的衣服,尴尬地对老人笑了笑,脸也涨得通红。同车乘客当场质疑老人当众擦座位“太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老人闻后立即诚恳地向小伙子道歉并表示自己确实有洁癖,而慈善的小伙子也当场表示自己并不介意。让座纠纷虽很快和解,但此事却引发满车乘客的热议,有的理解老人,有的认为老人的做法不妥。

农民工朋友在公交车上让座,乘客却嫌脏,在坐之前亲自擦拭座椅甚至索性不

坐,类似的报道频见诸媒体。除了好心让座却被嫌弃的心酸经历之外,更有一些外来务工者,有座不敢坐。去年,在武昌一辆双层公交上,面对女乘客邀坐,一名外来打工者模样的男子,却选择坐到车厢楼梯上;而在重庆一辆公交车上,甚至有位老太太直斥农民工穿得太脏,影响市容,应当走着回家……多少次,农民工兄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敢落座,要么站着,要么蹲着,要么坐在地上,他们小心翼翼,只为不被排斥。

如今,当“让座”这件几近成为道德标杆的小事儿发生在农民工兄弟身上时,个中意义似乎就更加非比寻常。身为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员,各方面待遇和保障虽然不尽如人意,却能在公共场所恪守公德、礼貌谦让,用一个合格市民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这无疑值得尊重。而这一次,老大娘的“洁癖”令农民工小伙的形象更加“高大全”,城市人的吹毛求疵、矫情做作等一系列的城市病,与农民工兄弟“让座”行为中所流露的质朴与温情形成巨大反差,有“洁癖”的城里人则无情地被钉在了道德的十字架上。

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想来,前一位乘客身上有泥土灰尘,难免带到了座位上,下一名乘客见状后,在坐之前擦擦也实在很正常。如果事件的主人公只是两位普通市民,那么这实在只是小事一桩,不致见诸报端引起争议。而当让座一方变为农民工兄弟,一桩小事便迅速升级发酵为一次道德审判甚或是阶层对立。

当然,农民工兄弟在公交车上的待遇之所以牵动公众神经,与近年来整体社会大环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注与重视

分不开。不可否认,在就业、医疗、教育等各方面,外来务工人员正在被给予越来越多的照顾和优待,并逐渐成为一个与普通市民一样有着公平待遇的群体。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对他们一丝一毫的歧视和冷漠,都难免令公众愤愤不满。

每一次的让座风波背后,公众所抱怨和议论的焦点都少不了道德这块主料,但动辄想当然地误读甚至惯性地二元对立,并不是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上的良好心态。作为与农民工共同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市民,生理上的“洁癖”其实没什么,心理上的“道德洁癖症”才真的可怕。

对外来务工人员有一颗关怀之心,不等同于就要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周遭的普通市民。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过去究竟对农民工兄弟做了什么,才让他们如此小心翼翼,

生怕遭遇歧视、受到排斥,更有必要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做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变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拉近他们与普通市民的距離。其中,帮助农民工提升自身文明素质,在公共场合尊重他人是一方面;提升普通市民的容忍度,或许更加迫切,比如能否容忍汗味、容忍泥土灰尘。只有时刻以微笑和真诚相待,才能真正让外来务工者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但愿下次再看到因座位而纠纷的他们时,能有人上前微笑地说一句:“这儿有座,您坐吧!”

